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解 垚 高梦桃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 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 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 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 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关键词: 公共转移支付; 消费相对剥夺; 收入相对剥夺; 收入不确定; 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 F81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30(2024)02-0040-12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 经济不平等是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近年来, 作为经济不平等主要表现形式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得到广泛关注, 而消费不平等的重视度相对不高。事实上, 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总体呈扩大趋势, 且近20年间上升了67%^[1], 相较于收入不平等, 消费不平等能够更好地体现居民的福祉水平和差异化表现, 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更大^[2]。其中, 消费不平等内在包含群体消费不平等和个体消费不平等, 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测度的群体消费不平等大致反映整体的不平等状况及变化趋势, 导致消费水平不同的个体拥有相同的不平等感, 忽视了个体对不平等程度的感知差异。现实中, 个体往往通过与参照群体比较来评价其地位和处境, 发现自己处于相对劣势状态, 由此产生被剥夺感。个体间的消费不平等, 即消费相对剥夺的改变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影响消费者的真实福利差异, 而且会作用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3]。因此, 探究个体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作用, 对于消费水平的均衡提升, 促进民生福利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23-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共同富裕视角下培育内生动力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23VRC0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相对贫困的财税治理研究”(72073081)

作者简介: 解 垚(1971—), 男, 山东临清人,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高梦桃(1996—), 女, 山西襄汾人,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面向家庭及个人的转移支付政策是财政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具有改善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4],中国90%以上的财政再分配是通过公共转移支付实现的^[5]。近年来,我国政府转移支付的覆盖范围和保障程度不断提高。其中,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支付主要以社会保障、救济和福利等方式实现,通过直接提高低收入和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及收入分配状况。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人均转移净收入6892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18.7%^①。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从而缩小了因制度、市场和个体因素等导致的消费差距,是改善消费不平等的重要途径^[4]。现有文献大多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且基于整体消费不平等的视角展开研究,但忽视了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无法刻画个体在参照群体中的相对剥夺程度。根据相对剥夺假说,相对剥夺不仅与个体的绝对利益(收入或消费)水平的改善有关,还和个体与参照群体利益相比得到的相对利益有关,甚至相对利益更为重要^[6]。实际上,公共转移支付在改善各个群体的消费水平上具有非均衡性,尤其是在激发弱势群体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和均衡消费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水平提升的差异性将导致个体在参照群中与其他消费者对比的相对差距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因此,公共转移支付可能对个体消费相对剥夺产生影响。文章通过构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标来衡量个体间的消费不平等,深入探究公共转移支付与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关系,对于全面理解我国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收入调节作用,以及完善公共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政府面向个人及家庭的公共转移支付是改善居民消费不足和消费不平等的有效政策工具,其收入增长效应、再分配效应和减贫效应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既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公共转移支付的直接消费效应,认为公共转移支付对改善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具有积极影响^[7]。一方面,政府对个人及家庭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提升相对贫困和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现期收入水平,放松家庭流动性约束,这不仅提高了弱势群体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为他们进一步实现发展性消费需求提供可能性,从而改善他们的消费结构^[8]。另一方面,公共转移支付为困难家庭应对不利冲击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帮助抵御风险^[9],改善居民未来收入预期,缓解家庭预算约束的限制,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需求,并增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从而实现消费量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转移性支出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受到经济周期、政策覆盖率、瞄准效率及补助力度等因素的影响^[10]。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从个体相对剥夺层面研究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甚为缺乏。已有文献较多关注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城镇内部消费差距、农村内部消费差距和总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11][12][13]},但对消费影响的比较尚未给予充分考虑,从而忽视了公共转移支付对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其中,边恕和张铭志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县级层面数据,发现扶贫转移支付有利于降低城乡居民总体消费差异,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与缓解流动性约束实现的^[12]。周广肃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实证检验了推行新农保可以有效降低农村的消费不平等程度^[11]。罗浩和周延实证发现养老保险降费会显著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家庭收入不平等是养老保险降费影响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中介变量^[13]。Forteza和Rossi认为转移支付与税收制度相结合,通过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弥补低收入之不足来降低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程度^[14]。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不能对转移支付缩小地区间收入或消费差距的效果过于乐观^[15],只有补齐低收入群体短板,给予该群体更高水平的公共转移支付,社会整体的收入差距才能够有效降低^[11]。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个体不仅关心自身的消费,而且更加关心参照群体内他人的消费,由于社会比较产生的差距感知将影响个体的消费行为与决策。宏观层面的整体消

费不平等会出现“总体性偏误”的结果,导致不同个体在特定群体中拥有相同的消费不平等感知,从而掩盖了不同个体消费变化对不平等的贡献。因此,在微观层面分析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时,采用个体层面的消费相对剥夺指数更为合适。在我国,个体层面消费不平等(即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16]、养老保险降费政策^[13]、住房财富^[17]以及家庭负债^[18]等,缺乏对于直接增加个体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其消费水平的政府行为对个人(或家庭)转移性支出的影响研究。

本文可能的贡献表现如下。第一,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公共转移支付对整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然而整体消费不平等难以有效反映家庭消费分布的结构和规律,不能准确描述居民的现实福利差距。本文将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引入分析框架,从微观视角探究公共转移支付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关系,拓展了公共转移支付的相关研究。第二,研究内容上,不仅分析并检验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作用,而且对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构性和异质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福利依赖”效应进行了充分探讨,从而扩展和补充了相关研究。第三,理论层面上,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通过缓解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提高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本文研究有助于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增进民生福祉,以期对制定差异化公共转移支付政策提供有益思考。

(二)研究假设

公共转移支付是政府实现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通常偏向中低收入弱势群体,目的是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从而促进居民消费,降低消费不平等。现实中,有限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充分支撑中低收入、相对贫困家庭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由此在参照群体中产生相对剥夺感。然而,公共转移支付作为家庭收入来源,能够通过直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使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张展和尹华北在研究中发现,转移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且这一影响在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低收入弱势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19]。刘雯指出公共转移支付和发放数额的增加会提高家庭总消费支出,低消费家庭受公共转移支付的影响更为显著^[20]。此外,扶贫转移支付、低保补助、精准扶贫政策等性质的转移支付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12]。公共转移支付不仅影响个体的绝对消费水平,也影响个体的消费相对剥夺。从家庭层面来看,为了在比较中彰显社会地位,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弱势家庭可以利用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提高其消费水平,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中低收入水平消费者在参照群体中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在参照群体中的消费相对剥夺。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 公共转移支付能够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

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最关键的变量,收入不平等是引起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21]。邹红等提出不同时期或者城镇内部、乡村内部收入不均都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关键所在^[22]。公共转移支付是我国再分配中用以调节收入水平、实现分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方向明和金吴文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降低了居民整体、城镇内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且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对于相对贫困家庭收入的重要性超过非贫困家庭^[23]。此外,政府对个人及家庭直接的公共转移支付,特别是五保户、低保户、特困家庭补助及退耕还林补助等特定类型的扶贫政策具有较好的瞄准效率,为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和生产提供了保障,有效缓解了收入不平等,同时较高减贫效率^[24],有利于改善低收入家庭在参照群体中的收入劣势地位,即公共转移支付降低了家庭收入的相对剥夺程度。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收入的增加会促使低收入、生计能力缺失的弱势群体增加基本生活消费支出,进而缓解个体的消费不平等^[25]。因此,个体获得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降低个体的收入不平等抑制个体消费不平等的扩张,显著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从而缓解处于消费不利地位家庭的相对剥夺状况。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 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居民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水平,还与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有关^[26],其中收入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27]。收入不确定性表明收入的不可预测性,当预期收入具有不确定性时,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会大于确定性下的边际效用。与其他短期收入相比,公共转移收入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28],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有利于增加居民福利,降低家庭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20]。例如,养老金和退休金为老龄人口提供了可持续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缓解家庭养老压力;低保补助、抚恤金等能够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居民在缺乏稳定收入来源时获得政府的补助,在面临风险时得到政府的兜底保障,政府的公共转移收入就能够为居民提供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为家庭消费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9]。而且公共转移支付资金的获得有益于家庭有效应对不利的收入冲击,实现家庭消费平滑。与此同时,家庭对未来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的预期也会影响消费的平滑^[30],尤其是生产性财政补助,不仅提高了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而且提升了居民增收能力,降低了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有助于改善消费水平,提升其在消费群体中的经济地位。由此,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缓解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降低居民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H3: 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改善收入不确定性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其作为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和行为,有利于改善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31]。其中,政府信任作为社会信任的组成,对信任主体的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向民众提供生产、生活等现金补助,可以更好地保障民生,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支持和满意程度。一方面,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居民对外部世界的信心、缓解内心对社会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感知,提升消费信心,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32]。另一方面,政府对家庭的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改善贫困群体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主观认识,增强个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希望,相信社会会为人的发展提供相对平等的机会与权利,激励个体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劳动参与和劳动生产率改善经济状况^[31],进而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状况。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4。

H4: 公共转移支付通过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收集的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2—2018 年的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该项调查数据涵盖社区、家庭和个人三个层次,包含收入、消费、公共转移支付等多重变量,是家庭研究的大规模权威数据之一。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基本单位,根据需要对样本做出如下筛选:(1)为了有效缓解户主年龄对消费偏好的差异,户主年龄小于 20 岁及户主年龄大于 60 岁的样本被排除在外;(2)剔除无法识别和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保证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3)为了消除极端离群值的影响,对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和家庭资产在内的各项指标进行上下 1% 缩尾处理。最后保留的有效样本规模为 20502 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家庭 13633 个,占全样本的 66.51%。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为考察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RD_{it} = \alpha + \gamma Trans_dum_{it} + \beta X_{it} + \eta_i + \sigma_t + \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 RD_{it} 是指第 i 个家庭在第 t 年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式(1)考察家庭是否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 $Trans_dum_{it}$ 表示第 i 个家庭在第 t 年是否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虚拟变量,系数 γ 反映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X_{it} 为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个体、家庭及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 η_i 和 σ_t 分别表示家庭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 ϵ_{it} 为随机干扰项。考虑到同一家庭不同年份的干扰项可能存在相关性, 使用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调整。

1. 被解释变量

对于家庭层面的消费相对剥夺, 学者们一般采用 Yitzhaki 指数、Kakwani 指数和 Podder 指数进行衡量。其中 Kakwani 指数克服了 Yitzhaki 指数和 Podder 指数的主要不足, 具有标准性和无量纲化的特性^[33], 因此本文选用 Kakwani 指数测度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其它两种指数用于稳健性检验。根据相对剥夺理论^②, 本文选取家庭所在区县样本作为参照群, 将各受访家庭与参照群中比其消费水平高的其他家庭进行比较, 从而得出该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具体测度过程如下。

假设组群 X 中有家庭数量为 n, 组群内家庭消费分布为 $X=(c_1, c_2, \dots, c_n)$, 按组群中的每个家庭的消费量进行升序排列, 得到 $c_1 \leq c_2 \leq \dots \leq c_n$ 。 μ_X 是组群 X 中全部家庭的人均消费均值, $\mu_{c_k}^+$ 是组群 X 中人均消费超过 c_k 的样本家庭的人均消费均值, $\gamma_{c_k}^+$ 是组群 X 中人均消费超过 c_k 的家庭样本量占总样本 X 的百分比。根据定义, 将每个家庭和参照群中的其他家庭进行比较, 该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可表示为:

$$RD(c_i, c_k) = \text{Max}(c_i - c_k, 0) \quad (2)$$

由式(2)可知, 若 $c_i > c_k$, 则家庭 i 对家庭 k 的剥夺为 $c_i - c_k$, 否则为 0。

那么 Kakwani 指数表示的第 k 个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为:

$$RD(c, c_k) = \frac{1}{n\mu_X} \sum_{i=k+1}^n (c_i - c_k) = \gamma_{c_k}^+ [(c_{c_k}^+ - c_k) / \mu_X] \quad (3)$$

2. 核心解释变量

公共转移支付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在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与否, 还体现在公共转移支付的持有量上。为此,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来衡量政府公共转移支付。(1) 家庭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二值虚拟变量, 根据调查问卷对“过去一年, 您家有没有收到下列政府补助?”问题的回答, 若获得相应补助取值 1, 否则为 0。其中, 政府补助主要包括: 低保、退耕还林补助、农业补助(包括粮食直补、农机补助等)、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款等。进一步地, 仅有 2012 年、2014 年问卷存在有关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具体类目, 由此将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划分为民生性转移支付和生产性转移支付进行异质性检验^③。(2) 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的连续变量。考虑到公共转移支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本文基于对“包括现金及实物折算, 过去一年, 您家一共收到价值多少钱的政府补助?”问题的回答, 采用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数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进行测度, 以有效衡量家庭对公共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

3. 控制变量

本文引入了户主、家庭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婚姻状态;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城乡类别、家庭规模、是否创业、家庭收入、家庭资产、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 地区特征方面控制了区县平均收入。主要变量的定义及统计描述的结果见表 1。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估计

表 2 列示了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回归结果。为保证模型估计的稳健性, 列(2)和列(3)逐步控制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的相关特征变量。估计结果显示,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家庭的平均消费相对剥夺程度低于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家庭, 即公共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具体来看, 与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家庭相比, 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会使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平均降低 2%, 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Kakwani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区县层面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	20502	0.417	0.228	0	1
核心解释变量	公共转移支付	家庭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	20502	0.665	0.472	0	1
		公共转移支付数额/家庭可支配收入	20502	0.056	0.160	0	1
	性别	男性=1;女性=0	20502	0.511	0.499	0	1
	年龄	受访者在调查年度的年龄(岁)	20502	44.347	10.249	20	60
	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年) ^④	20502	7.507	4.479	0	22
	健康状况	取值 1~5,取值越大,健康状况越好	20502	2.944	1.220	1	5
	婚姻状态	已婚=1;未婚=0	20502	0.883	0.322	0	1
	城乡类别	城镇=1;农村=0	20502	0.420	0.494	0	1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人数(个)	20502	4.020	1.718	1	17
	是否创业	家中有人从事个体私营为 1,否则为 0	20502	0.100	0.299	0	1
	家庭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20502	9.095	1.164	0.250	15.102
	家庭资产	家庭人均净资产的对数	20502	10.820	1.300	3.219	17.038
	老年人口抚养比	老人(65岁及以上)所占比重	20502	0.068	0.146	0	1
	少儿人口抚养比	少儿(14岁及以下)所占比重	20502	0.146	0.171	0	1
	区县平均收入	家庭所在区县平均收入的对数	20502	10.827	0.434	9.491	14.413

表 2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变量	(1)	(2)	(3)	变量	(1)	(2)	(3)
	Kakwani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Kakwani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公共转移支付	-0.024*** (0.007)	-0.020*** (0.007)	-0.020*** (0.007)	家庭收入			-0.017*** (0.002)
性别		-0.003 (0.005)	-0.002 (0.005)	家庭资产			-0.021*** (0.003)
年龄		0.002*** (0.000)	0.001*** (0.000)	老年人口抚养比			0.053*** (0.019)
教育水平		-0.002** (0.001)	-0.001* (0.000)	少儿人口抚养比			0.035* (0.019)
健康状况		-0.001 (0.002)	0.001 (0.002)	区县平均收入			0.068*** (0.009)
婚姻状态		-0.028*** (0.010)	-0.015 (0.011)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乡类别			-0.031*** (0.01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家庭规模			-0.036*** (0.002)	常数项	0.429*** (0.005)	0.399*** (0.019)	0.210** (0.097)
是否创业			-0.013 (0.009)	观测值	20502	20502	20502
				R-squared	0.340	0.352	0.368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从控制变量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产生的影响来看,户主层面变量表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人们倾向于通过家庭储蓄的方式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抵御养老、医疗和其它不确定风险的增加,使得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状况变差;户主受教育水平更高,其在劳动力市场因更具竞争优势获得更高收入,进而使得消费水平高于其所在群体的其他家庭;已婚状态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相对较低。家庭层面变量表明,相比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更高;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由于收入来源更广,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金和物质帮助以平滑消费的能力越强,消费相对剥夺较低;收入和资产财富更高的家庭由于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小,提升了其消费水平在参照群体中的排名;老年

人口抚养比和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均为正,表明处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口和少儿人数增加,使得家庭面临更大的生活开支,家庭储蓄动机更加强烈;创业会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但是这一影响并不显著。从区域特征来看,区县平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越高。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基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如下稳健性讨论。(1)替换变量。首先,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的对数,发现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公共转移支付数额增加1%,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降低4.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充分表明,公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数,缓解家庭消费不平等状况。其次,采用 Yitzhaki 指数和 Podder 指数分别测度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公共转移支付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基准估计结论。(2)改变回归方法。为排除时间、地区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我们选择采用区县固定效应和时间与地区的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回归。(3)考虑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能对私人转移支付产生“挤出”效应,为此本文检验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对私人转移支付的影响。参考周广肃等的做法^[11],我们选取“家庭从不同住的亲戚那里获得的经济帮助”的人均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家庭公共转移支付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依旧与上文保持一致。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如果家庭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亲戚对其的经济帮助并未显著降低,即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并未对私人转移支付形成挤出作用。因此,家庭消费水平将显著提升,有利于消费相对剥夺状况的改善。

(三)内生性分析

回归模型可能因遗漏变量、双向因果或测量误差等原因导致内生性,引发模型估计产生偏误。具体来看,家庭当年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以及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规模并非随机的,有可能与个体及家庭的异质性特征密切相关,即公共转移支付覆盖的群体并非“随机样本”,而是“自选择”的结果;家庭在参照群体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可能影响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可能会受到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比如户主性格特征、家庭背景等,而这些因素在定量分析中难以进行全面准确的量化。基于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控制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等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Yitzhaki 指数	Podder 指数	区县固定效应	联合固定效应	私人转移支付
公共转移支付		-0.133 *** (0.040)	-0.040 *** (0.012)	-0.042 *** (0.012)	-0.042 *** (0.007)	0.167 (0.173)
公共转移支付数额的对数	-0.046 *** (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观测值	20502	20502	20502	20502	20502	20502
R-squared	0.368	0.441	0.392	0.392	0.397	0.352

1.工具变量法。根据工具变量的选择标准,本文选取家庭“是否获得私人经济支持或赠予”以及“是否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一期滞后项作为家庭公共转移支付获取与否的工具变量^[7]。一方面,家庭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收入与家庭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取情况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政府给予家庭的公共转移支付具有一定的惯性,滞后期的家庭公共转移支付获取情况与当期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存在相关性,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除政府补助外,私人转移性收入的数额通常较小,难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明显影响;滞后期的家庭公共转移支付获取情况与家庭当期消费决策无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表4列(1)估计结果显示,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公共转移支付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这一结论稳健。

2.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选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缓解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该方法将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使用半径匹配、近邻匹配、和核匹配等方法对样本实验组(treated=1,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和控制组(treated=0,未获得公共转移支付)进行匹配后,使用匹配后的平衡样本对模型进行估计。其中,平衡性条件要求对协变量在匹配后的控制组和处理组间的均值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协变量在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间的均值差异的P值多数大于10%,且标准化偏误多数小于10%,说明协变量在匹配后的控制组和处理组间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了共同支撑和平衡性条件检验^⑤。表4第(2)~(4)列结果显示,基于半径匹配、1:1近邻匹配法和核匹配法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估计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结论具有可靠性。

3.控制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2011—2020年我国掀起了一场全面脱贫攻坚的斗争,在此过程中,获得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家庭,可能本身就是贫困户,在“精准扶贫”斗争中获得了更多转移性支出以外的帮助,这同样对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产生显著影响。中国精准扶贫政策于2013年提出,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实施,2015—2016年政策全面落地。为了排除精准扶贫政策对基准估计结果的冲击,我们选择2016年和201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将低于收入划分标准的家庭划分为受到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的家庭,取值为1,否则为0。其中,精准扶贫政策规定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对应CFPS中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分别以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625元、2800元和2952元为划分标准^[34]。回归结果见表4列(5)和列(6)。结果显示,控制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后,核心解释变量公共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依然显著为负,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工具变量法	半径匹配	倾向得分匹配法 近邻匹配	核匹配	控制精准扶贫政策	
公共转移支付	-0.023*** (0.007)	-0.030** (0.008)	-0.034*** (0.007)	-0.031*** (0.007)	-0.020*** (0.007)	-0.019*** (0.004)
精准扶贫					-0.012** (0.006)	-0.008* (0.0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015	13748	18895	20493	3612	9425
弱IV检验	617.391(16.38)					
IV可识别检验	546.401(0.0000)					
R-squared	0.177	0.140	0.207	0.184	0.318	0.187

注:(1)列中,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检验弱IV,括号内数值为Stock和Yogo(2005)^[35]在容忍10%偏误水平对应的临界值;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进行IV可识别检验,括号内为相应的P值。结果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有效。

(四)异质性分析

1.公共转移支付类型差异

按照公共转移支付类型分组,将其划分为以低保、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作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和赈灾款等为代表的民生性转移支付和以农业补助、退耕还林补助等为代表的生产性转移支付^[8],进而探讨不同公共转移支付类型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差异化影响。鉴于研究数据的可得性^⑥,本文采用2012年和2014年的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5列(1)和列(2)结果显示,只有生产性转移支付能够有效缓解家庭消费的相对剥夺程度。这表明,一方面,低保等民生性转移支付参与率相对较低,且受众多为因病因灾导致劳动能力缺失、经济十分困难的个体和家庭。同时,民生性转移支付政策在落实方面存在精英俘获、瞄准偏误等问题,没有切实帮助到目标群体,影响了民生性公共转移支付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以农业补助为代表的生产性转移支付多用于生产性投资以扶持和鼓励农民投入生产,达到实现农业发展、改善居民收入、提升内生化发展动力和自身发展能力的目的。而且相关政策实施强调普惠性和公平性,有利于平滑农村居民消费,提升其在群体中的经济地位。

表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生产性	民生性	贫困县	非贫困县	高抚养比	低抚养比
公共转移支付	-0.011*** (0.003)	0.012 (0.014)	-0.017*** (0.003)	-0.005*** (0.002)	-0.019*** (0.006)	-0.008**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305	1668	4921	15581	5306	15196
R-squared	0.156	0.159	0.232	0.356	0.224	0.232

2.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差异

与非贫困县相比,贫困县地区在自然资源、制度和经济发展等禀赋方面有较大差距,而且居民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不足等原因,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家庭收入水平通常较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较高。根据2012年公布的全国贫困县名单,将总样本划分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表5列(3)和列(4)的分组结果显示,与非贫困县家庭相比,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地区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作用更强。因此,公共转移支付促进家庭收入状况改善在贫困落后地区的效果更加明显,而且对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作用更加显著。收入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居民消费,有利于缓解贫困县家庭消费相对剥夺。这一结论表明公共转移支付政策靶向性较强,有利于贫困县家庭充分利用公共转移支付提升自身消费水平以缓解消费的相对剥夺状况。

3.家庭抚养比差异

随着微观消费理论不断完善,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36]。家庭中少儿和老年人等非劳动人口占比会对家庭收入和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高抚养比家庭与低抚养比家庭在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相比抚养比较低的家庭,抚养比较高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对高抚养比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可能更大。我们采用家庭中非劳动力人口(14岁及以下的少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劳动力人口之比来衡量家庭抚养比,按照家庭抚养比是否大于等于0.5进行区分。表5列(5)和列(6)回归结果表明,与低抚养比家庭相比,公共转移支付的获得对高抚养比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更大。

五、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和提高社会

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为此,借鉴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具体方法如下。(1)采用 Kakwani 指数计算“区县层面参照群中各样本的收入相对剥夺”,以此检验家庭收入相对剥夺在公共转移支付减小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中的中介效应,结果验证了公共转移支付通过缓解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状况,进而降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2)参考沈坤荣和谢勇的研究^[37],以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其对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城乡类别、家庭规模、是否创业、家庭资产以及所在省份等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所得方程的预测值和残差分别代表家庭的持久收入和不确定性收入,系数大于0表示存在有利的不确定性,小于0说明存在不利的不确定性。由于残差平方是其方差的无偏估计,因此对残差平方进行对数标准化处理。列(2)结果显示,公共转移支付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共转移支付通过增加有利的不确定性,降低不利的不确定性,使得家庭的意外收入增加。结果表明,公共转移支付显著增加家庭有利的收入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居民家庭面临的有利不确定性增加(即人们的收入预期得以稳定)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进而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3)社会信任中介变量选自CFPS问卷:“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当受访者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时,取值为1;当回答“越小心越好”时,取值为0。政府信任变量取自问卷“对干部/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得分变量为0~10,分值越大表示居民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表6列(3)和列(4)结果显示,公共转移支付显著增加了家庭的社会信任水平,尤其是对于政府的社会信任,从而促进家庭消费,改善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由此,H2~H4得以验证,即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表6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家庭收入相对剥夺	收入不确定性	社会信任	政府信任
公共转移支付	-0.017*** (0.004)	0.085** (0.035)	0.082*** (0.008)	0.159*** (0.01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502	20502	20493	20493
R-squared	0.201	0.253	0.046	0.089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情况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结果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状况的改善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提高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政府应增强政策的瞄准性和公平性,持续扩大公共转移支付制度的覆盖面和规模,注重将高抚养比家庭纳入保障范围,加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县的公共转移支付力度。与此同时,通过建立针对获益群体的动态监测评估系统强化进出动态管理。如政府运用大数据思维对获益群体进行动态监测,对产生“福利依赖”的群体进行警示,建立有效反馈机制,以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第二,践行差异化政策管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应加强生产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巩固惠农政策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积极影响,减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负担和阻碍,从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充分提高农

村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应向贫困县、高抚养比家庭等进行倾斜,对于较发达的地区,应确保现有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实现公共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着力于解决居民差异化需求。第三,注重提升相对弱势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加强公共转移支付政策与医疗、教育、就业等其他配套措施的协调互补,鼓励低收入或低消费群体积极增加劳动供给,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收入稳定性,减少家庭脆弱性,消费提升效应才会充分发挥,进而缓解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状况。如推行实施“百万农民工培训教育工程”,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段的教育资助政策体系”,提升农村居民、经济困难学生人力资本,提升其职业发展能力,实现就业更稳收入更高。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址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715.html。

②默顿(R.K.Merton)认为,当自身处境与参照群中的其他个体相比较并发觉自己处于劣势时,意味着自己遭受了剥夺。这种剥夺的衡量标准不是绝对的或永恒的,而是基于同某一变量(其他人、其他群体、过去的自己)的比较,因此这种剥夺是相对的。

③本文将公共转移支付划分为民生性转移支付和生产性转移支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异质性影响。其中,民生性转移支付包含低保、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款;生产性转移支付包含退耕还林补助和农业补助(包括粮食直补、农机补助等)。

④小学以下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12年,大专、高职15年,大学本科16年,硕士研究生19年,博士研究生22年。

⑤限于篇幅,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结果留待被索。同时,本文使用了不同匹配方法,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

⑥由于只有2012年和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披露了家庭获得的公共转移支付的具体类别,因此本文将使用2012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与此同时,由于调查数据并未对获得公共转移支付各类目的数额进行明确区分,因此在清除同时获得生产性转移支付和民生性转移支付样本的基础上对不同转移支付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此外,我们得出在不清除同时获得生产性转移支付和民生性转移支付样本的情况下,研究结果没有根本性变化。

参考文献:

- [1] 赵达,谭之博,张军.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新视角与新证据[J].财贸经济,2017(6):115—129.
- [2] 孙豪,胡志军,陈建东.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估算及社会福利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12):41—57.
- [3] 熊猛,叶一舵.相对剥夺感: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6(3):438—453.
- [4] 杨灿明.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启示与意义[J].经济学动态,2021(9):33—47.
- [5] 解亚.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再分配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8(8):116—131.
- [6] 任国强,黄云.相对剥夺对个体健康影响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7(2):112—123.
- [7] 朱德云,王溪.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1):106—114.
- [8] 解亚,李敏.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J].中国人口科学,2022(1):99—112.
- [9] Atkinson, A.B., et al. Income Distribution in OECD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Z]. Social Policy Studies, 1995.
- [10] 边恕,张铭志,孙雅娜.农村贫困补助的瞄准精度、瞄准成本与减贫方案分析[J].人口与经济,2020(4):112—124.
- [11] 周广肃,张玄逸,贾琿,张川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20(4):1467—1490.
- [12] 边恕,张铭志.扶贫转移支付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1(3):56—68.
- [13] 罗浩,周延.养老保险降费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J].消费经济,2022(5):64—74.
- [14] Forteza, A., Rossi, I. The Contribution of Government Transfer Programs to Inequality. A Net-Benefit Approach[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9, 12(1):55—67.
- [15] Perry, G. 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Virtuous and Vicious Circles[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6.
- [16] 李晓飞,臧旭恒.“多轨制”养老金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J].经济评论,2022(4):130—147.
- [17] 张雅淋,吴义东,姚玲珍.住房财富“寡”而消费“不均”?——青年群体住房财富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研究[J].财贸经济,2022(3):98—113.
- [18] 张雅淋,姚玲珍.家庭负债与消费相对剥夺——基于住房负债与非住房负债的视角[J].财经研究,2020(8):64—79.

- [19] 张展,尹华北.转移收入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消费经济,2011(5):12—15.
- [20] 刘雯.公共转移支付与农户消费[J].经济经纬,2021(4):23—32.
- [21] 陈志刚,吕冰洋.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关系[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12):32—45.
- [22] 邹红,李奥蕾,喻开志.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J].经济学(季刊),2013(4):1231—1254.
- [23] 方向明,金昊文浩.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基于相对贫困和地区差异的视角[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3(5):59—67.
- [24] 王庶,岳希明.退耕还林、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基于21省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J].经济研究,2017(4):106—119.
- [25] 周飞龙,张军.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及地区差异[J].财贸经济,2019(5):143—160.
- [26] Hall, R.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6): 971—987.
- [27]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4.
- [28] 胡日东,王卓.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4):29—32.
- [29] 朱德云,王溪,宫锡强.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J].财政科学,2021(5):31—45.
- [30] 惠炜,惠宁.消费平滑理论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6(2):101—113.
- [31] 单德朋,张永奇,马梦迪.社会信任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社会,2021(2):29—43.
- [32] 杜鹏程,刘艺铭.社会信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1):38—54.
- [33] 黄云,任国强,周云波.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9(3):25—37.
- [34] 陈昊,陈建伟,马超.助力健康中国:精准扶贫是否提高了医疗服务利用水平[J].世界经济,2020(12):76—101.
- [35] Stock, J.H., Yogo, M.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80—108.
- [36] 姚青松,赵国庆.抚养比、年龄结构与我国居民消费:1995~2014[J].金融评论,2016(2):39—48.
- [37] 沈坤荣,谢勇.不确定性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3):1—13.

The Impact of Public Transfers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XIE E GAO Mengtao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ublic transfers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the mechanism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ublic transfers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the findings remain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alleviating potential endogeneity problems. Heterogeneity results reveals that productive transfers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compared to livelihood transfers; public transfer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consump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poor counties and households with high dependency ratios. Mechanism tests suggest that public transfers allevia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by reducing household income relative deprivation, improving income uncertainty and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This study provides micro evidence for alleviating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improving the welfare level of residents,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Public Transfers; Consump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Income Relative Deprivation; Income Uncertainty; Social Trust

(责任编辑:肖加元)